

卷一
戰後的香港與教協崛興的背景

一、非典型的殖民地統治

從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談到戰後香港歷史的分期

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晚上，十八萬人集合在港島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，紀念北京「天安門民主運動」被血腥鎮壓二十三周年。參加者滿佈公園的全部六個足球場和多處草坪；集會時高舉手上的蠟燭或手提電話，同聲喊叫口號：「平反六四！」、「追究屠城責任！」、「結束一黨專政！」公園外還有不少人耐心排隊等候進場。香港警察在公園入口維持秩序，設法疏導人潮，沒有妨礙集會的進行。入口之內，則有數以百計的義工，代表多個不同民運團體派發傳單、收集捐款等等。排隊進場的人，須擠過層層的義工才能夠到達燭光晚會的會場。

這樣的晚會，自一九八九年以來，在香港已經舉行過二十多次，每年都會呼籲中國政府實施民主改革。二〇一二年的參加者，大部分是「八十後」或「九十後」的年輕香港人，也有些來自中國大陸或海外的訪客夾雜

其中。大家都知道，香港是「五星旗」下，唯一官方允許公開悼念「六四」的地方。一九九七年政權轉移後，香港政府對這類紀念活動的容忍程度，無論在香港還是在海外，普遍視作香港公民權利消長的重大指標。如此長情地悼念六四，而且稱之為「愛國民主運動」（世間有不愛國的民主運動嗎？），顯然是強烈認同中國的表現；但同時，也因為「香港人這樣做，別的中國人不能夠（或不會）這樣做」而引以自豪，顯然是強烈認同香港的表現。這種雙重認同是怎樣形成的？跟香港的殖民地歷史有沒有什麼關連呢？

香港每年的六四紀念晚會是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」（簡稱「支聯會」）主辦的。支聯會是數十個香港民間組織的聯會。二十多年來，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」（簡稱「教協」）一向是支聯會主要支柱的團體。教協是香港會員人數最多的單一行業工會。香港現職教師九成以上，以及不少退休教師，都是它的會員。四十年來，從一九九七年政權轉移之前的「過渡時期」，以至「跨越九七」以後，教協一向對香港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堅持獨特地發聲。可以說，教協反映許多香港人的雙重認同心態：既是無可置疑的、不折不扣的「中國人」，同時也堅定不移地、有意識地抱緊香港的「核心價值」，抱緊香港區別於中國的一些「慣習」。每年紀念六四，可以說是香港人雙重認同——中國民族主義者和香港人獨特身份同時並存——最顯著的表徵：「以香港方式繼續愛國」。而教協便是體現這「雙重認同」的最重大民間組織。

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晚會的規模或性質，在一九七二年的香港是不能想像的。事實上，沒有七十年代香港經歷的連串和平抗爭與演變，教協和香港人支援中國民主運動、爭取香港民主化等改進的群眾和平動員，也是不可能的。七十年代是戰後香港歷史上最關鍵的時期——香港從一處「借來的地方」，過着「借來的時間」，蛻變成獨特社會的十年。要了解四十年來的香港，就得掌握教協的歷史；而要了解教協的歷史，就必須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香港這個英帝國殖民地違逆世界潮流的發展。

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接近七十年的歷史，往往以八十年代中葉作為分界：經濟和社會的演變，劃分為「工業時期」和「後工業時期」。這種分期，剛巧也適用於港、內地、英政府關係的歷史，因為一九八四年的《中英聯合聲明》把之前「借來的時間、借來的地方」轉化成之後的「一國兩制」。

從教育史的角度看，八十年代中葉也是饒有意義的分界：一九八三年港英政府設立「教育統籌委員會」（簡稱「教統會」Education Commission），致力整頓戰後四十年香港教育急促膨脹所產生的多種質素問題，嗣後一系列《教統會報告書》掀起了連串教育改革。

另一方面，如果我們的着眼點是香港境內的官民關係，把分期的界線劃在七十年代會更為恰當。戰後，經過「十年生聚、十年教訓」，到了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間，戰後的新生代長大成人，開始對殖民地政府施政的多個

1984年，港英政府設立之「教育統籌委員會」發表了《第一號報告書》，正式掀起了連串教育改革。

教育統籌委員會
第一號報告書

一九八四年十月

層面提出質疑。七十年代爆發了一連串的和平抗爭運動，促使政府逐漸改善施政的內容和手法，同時也確立了今天香港人所謂的「核心價值」：人人都享有做人的尊嚴與平等的基本權利；人人都應有言論、集會和結社的自由；政府應要透明、廉潔、尊重民意；受治者對不公平、不合理的事情，有權公開地和平抗爭、表達冤屈、尋求補救與改善等等。這些在香港的生活方式裏經常體現的「核心價值」，跟現代世界的「普世價值」掛勾，同時標誌着香港人擁有獨特的文化，是與別不同的中國人。七十年代在香港冒起的「公民社會」和社群認同，明顯區分了前後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型態：開埠以後百多年持着「過客心態」的「華僑」社會，以及七十年代後的「永久居民社群」。由於一九七三年的教師罷課和反貪污運動，以及因而相繼成立的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」和「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」，是香港官民關係改變的關鍵發展，因此而採用七十年代中葉作為戰後香港歷史的分期線，是特別有意義的。

本書探討教協的歷史，必須放置在香港歷史的脈絡中才能理解。第一章先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四十年間香港的人口、社會及語言變遷。變遷的脈絡是全球的「非殖化」運動，以及香港經歷的非典型殖民地統治：為什麼戰後的香港不像世界上大多數殖民地般，爆發「反殖」運動，爭取自主呢？此章也同時探討戰後香港的經濟發展，怎樣在冷戰的氛圍裏，從殖民地通商口岸，轉化成為「亞洲四小龍」之一的世界經濟重鎮。第二章討論戰後英帝國收縮，香港政府職權增加，逐漸成為半自主的親商城邦。與此



二戰後，香港經濟凋零，百廢待興；圖為1946年的九龍城嘉林邊道。

同時，香港居民也從難民、過客、僑居者，凝聚成為擁有「既是中國人，也是香港人」的「雙重認同」的「永久居民」。第三章探討戰後三十多年，香港教育體系急促膨脹的社會意義。澄清了香港戰後歷史發展的脈絡後，從第四章開始，則交代教師抗爭和教協的事跡。

戰後四十年香港的人口、社會及語言變遷

今天的香港是世界級的大都會，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，它只是一個前景不明朗的殖民地通商口岸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軍宣佈無條件投降。當時香港的人口，還少於八年前「七七事變」，日本開始全面侵華時。香港經濟凋零，民不聊生。幸而，在三兩年內，香港的轉口貿易恢復得很快，人口也迅速增長——這都是因為受到大陸國共兩黨內戰的刺激。四年血戰，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。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，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在北京宣告成立。戰敗的國民政府「播遷」台北，另起爐灶。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，成為兩者之間的緩衝區，出乎世人意料之外，發展出獨特的經濟、社會和文化生活模式，成績彪炳。教協是這獨特模式的一個顯例。

中國各黨派都認定「鴉片戰爭」、《南京條約》、「割讓」香港等史事是「國恥」，必須昭雪。第二次大戰期間，中方曾提出「收回香港」，而英方

也表示可於戰後適當的時機展開談判。因此，一九四五年香港的前景是存疑的。日本投降不久，「解放戰爭」隨即爆發，「適當」的談判時機也就無疾而終。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承認「香港殖民地」的「合法性」，訂定了對香港「長期打算，充分利用」的方針。於是，英國對香港的「殖民地統治」得以延續五十二年。

自從開埠以來，每逢中國局勢發生重大變化，香港的人口都會大起大落。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大陸內戰期間，香港人口急增。到了一九五五年，香港原居民和南來移民，連同他們的新生子女，共約二百五十萬人，是一九四五年的五倍。二十世紀中葉以後，港府對南來人口設限，可是來自中國大陸的「合法移民」或「偷渡者」並沒有休止。南來人潮的最高峰時間大概是六十年代初（當時，毛澤東推行的「大躍進」所釀成的饑荒，令全中國餓死了數千萬人）和七十年代中後期（毛的「文化大革命」後期及毛死後初年）。據一九八六年的戶口調查，全港人口共錄得約五百四十萬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十倍。

戰時不少香港房屋受到破壞。戰後，人們要尋覓居所、校舍並不容易。人口激增，房屋短缺問題嚴重惡化（香港政府大規模建設「徙置大廈」的政策，要到一九五四年才開始）。千千萬萬人露宿街頭，或在山邊、天台等地方搭建寮屋棲身。「一家八口一張牀」是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口頭禪。如此窘迫的環境，當年到底有多普遍，現在雖難以稽考，但肯定不是絕無僅有的。物質條件極度貧乏，是當年香港社會上絕大部分人的生

1945-1949年，中國局勢發生重大變化，英治下的香港成為國共緩衝區，社會相對太平；圖為早期的太平山。





早期香港物質條件極度貧乏；圖為徙置區兒童輪候牛奶及維他命救濟，攝於1959年。

活狀況。尚幸的是，香港還未淪落至戰前上海經常出現的餓殍棄街情況，因為還有不少就業機會。南來新移民多半身無長物，他們帶到香港的，是勤奮工作的心和各種謀生技能。新移民的勤奮，配合起商人的靈活營運技巧和貿易網絡，造就了香港的工業化和「經濟起飛」。七十年代，香港便成為了「亞洲四小龍」之一，傲視全球。

二十世紀中葉的新移民，絕大部分對戰前香港沒有什麼回憶，更遑論什麼歸屬感了。新移民的子女在香港出生或成長，對他們父母心繫的故鄉缺乏深刻認識，幼年時對香港也沒有多少感情，難免是「無根的一代」。及至七十年代，戰後新生代成長了，情況才扭轉過來。新的情況，體現在語言適應和社群凝聚。

新移民為香港帶來在家鄉承傳的語言和文化。他們多半來自廣東，也有來自中國大陸的五湖四海。文字雖然劃一，但口語卻大異其趣。因此，五十年代「香港電台」每晚的新聞廣播都需要用多種語言讀出：先用大多數人明白的粵語，然後讀國語、客語、潮語、滬語等等。語言的適應，是香港社會最早和最明顯的轉變。到了六十年代中期，粵語已毫無疑問是香港社會的通用語言——端賴小學教育日漸普及以及「原子粒」（半導體）收音機的廣泛使用。擁有共同語言，是促成社群凝聚的條件。

社群凝聚，令到殖民地統治者在星馬等地慣用的分化族裔或語言的伎倆，較難於香港奏效。五十至八十年代，粵語是香港教育、廣播和商業的

主要語言——尤其在一九六七年後，無線電視迅速普及，深入民間，把新興的連續劇集和粵語流行曲廣泛傳播。粵語廣泛使用，發展出愈來愈豐富的詞彙、句式、表達習慣等，足以傳達任何現代社會的訊息——包括社交、財經、政治、心靈、文藝、娛樂、科技、時事等各方面的訊息。粵語的成長，有賴港人兼收並蓄，既不斷吸納海峽兩岸印刷媒體的新詞彙，又在本地的文言（「舊文學」）教育的基礎上，自創表達本地生活的新詞彙和表達風格（例如意指「升降機」的「𨮒」字乃借自英語lift，它兼具《說文》六書「形聲」和「會意」的造字原理）。七十年代以後，本地傳媒逐漸由受過本地教育的新聞和演藝人員擔綱，他們把新興詞彙推廣開來。六十年代下半葉，香港大專學生發動的「中文運動」迫使香港政府更改開埠以來唯英文獨尊的語文政策，在公文和議會裏兼用中文，使到粵語和港式白話文的使用領域更為廣泛。粵語遂從「土語」(Patois)躍升到社會語言學家所謂「強勢語言」(high language)的地位，同時也成為本地人身份的重要表徵。教師在這個語言發展歷程上的貢獻最大。粵語在公眾場合和大眾傳媒的強勢運用，也是七十年代以來香港公民社會的一份凝聚力。（現代語言學家認為，所謂「國語」與「方言」的區分，是具政治性的，跟語言的質素沒有必然關係。以語言的社會功能劃分，可分為只能在家居或里弄使用的

1. 參閱鄒嘉彥、游汝杰編著：《漢語與華人社會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1），第四章。

「弱勢語言」(low language)，在不同場合都能使用「入得廚房，出得殿堂」的「強勢語言」，以及各種「強勢語言」之間的「最強勢語言」(supreme language)。依此分類，粵語在香港日常生活中一向擁有若干領域的強勢，戰後數十年間，它更從「弱勢語言」演化成為在更多領域都能使用的「強勢語言」；而英語則保有「最強勢語言」地位。²

從香港居民的經歷看，香港在二十世紀後半期的許多發展，都歸因於二十世紀中葉的歷史，遠多於十九世紀中葉的。一九七一年的戶口普查，可以視作分水嶺：這年，是香港開埠以來首次錄得本地出生居民超過整體人口半數——當然還有不少居民是在大陸出生，且在香港長大和受教育的。這項統計的意義在於，「土生」、「土長」的戰後新生代逐漸從殖民地社會「寄人籬下」的「僑居過客」心態，轉化成有歸屬感、堅持居民權利的「永久居民」心態。³七十年代成年的人，也就從「無根的一代」，轉化成為「有根」的第一代了。人對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地域有了歸屬感，才會謀求改良這地方。七十年代初教師的抗爭運動，促使教協成立，可說是這份歸屬感的體現。

2. 同上註，第四章。

3. 參閱 Wang Gungwu, "A Note on the Origins of Hua-ch'iao," in *Community and Nation: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* (Singapore: Published for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by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[Asia], 1981), pp. 118–127; 及 Wang Gungwu, *The Chinese Overseas: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* (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00), chapter 3.